

从专守防卫到前沿制衡： 试析日本“根本性强军”^[1]

王 旭 徐永智

【内容提要】“根本性强军”是日本最新一轮安保政策调整的最主要内容，折射出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出现重大转型。日本正在加速构建区域拒止体系，强化无盟伴支援下可持续作战能力，并不断深化美日同盟及“美日+”安全合作。日本决意“根本性强军”，主要源自对于“中国威胁”的错误认知。日本长期奉行重实力、轻意图的战略文化，往往“料敌从宽”地设想十年后与假想敌的实力对比以谋求占据军力优势，而当前的内政外交环境使其强军决策缺乏制衡。日本本轮“根本性强军”正在不断推进，这影响中国和地区安全，推升美国军事介入地区事务的能力与意愿，将加速美东亚安全框架嬗变并加大中日关系改善的难度。石破茂上台后释放出改善中日关系的信号，但没有回调日本国家安全战略，“根本性强军”仍在推进。该问题值得关注。

【关键词】日本安保政策 根本性强军 美日同盟 东亚安全 成本强加

【作者简介】王旭，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涉外法治与安全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法学博士；徐永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北亚研究所日本安全保障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法学博士。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 (2025) 01-0066-26

[1] 作者感谢《和平与发展》匿名评审专家及编辑部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中错漏概由本人负责。

近年来，日本以“根本性强军”^[1]为战略基点，推动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大调整，加速推进自卫队作战体系的转型与区域安全角色的重塑。2022年末，《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整備计划》三份纲领性战略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日本彻底摒弃战后“专守防卫”原则，转向“主动拒止、前沿制衡”的进攻性安全逻辑。这一战略转向绝非孤立之举，而是深嵌于日本保守势力“摆脱战后体制”的历史执念、中美战略博弈加剧的结构性压力，以及东亚权力格局变迁的多重脉络之中。尤为值得警惕的是，日本以所谓“中国军事威胁”为叙事支点，通过构建区域拒止体系、强化自主持续战力，以及推进“美日+”多边准同盟网络三大支柱，实质谋求对华“成本强加”和威慑能力，其战略意图已超越传统防御范畴，直指对西太平洋制海制空权的系统性争夺。这不仅折射出日本对华战略认知的严重误判，更暴露出其借助美国“印太战略”实现军事正常化的深层诉求。

既有研究多从宏观视角^[2]，诸如突破和平宪法束缚、配合美国共同遏制中国、为台海军事冲突做准备、受俄乌冲突影响而加速等，剖析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转型，却对决策机制内生的“威胁评估偏误”与“战略文化惯性”关注不足。本文立足于决策过程分析，揭示日本防卫省如何通过“料敌从宽”的推演机制，虚构十年后中日军力对比的“最坏情景”，进而将“根本性强军”包装为应对“中国威胁”的必然选择。同时，文章系统论证日本强化区域拒止能力的战术逻辑：依托地理与技术的双重优势，阻止中国掌握制海制空权，迫使潜在冲突向持久消耗战演变，从而在西太平洋地区形成对中国的战略威慑。

当前，石破茂内阁虽释放出改善中日关系的信号，但“根本性强军”进程未见减速，其引发的安全外溢效应正持续发酵：一方面，日本进攻性

[1] 为确保表述的严谨性与专业性，本文将日本防卫政策中的“防卫力的根本的强化”（日文直译）统一称为“根本性强军”。

[2] 房迪、刘江永：《日本国家安保战略的重大变化与战略影响》，载《国家安全论坛》2023年第1期，第37—46页；项昊宇：《日本“安保三文件”初析：战略转型与前景展望》，载《和平与发展》2023年第1期，第97—112页；江新风：《日本防卫政策调整、动因及其影响分析》，载《日本研究》2023年第1期，第21—22页。

战力与美军指挥体系的深度融合，将显著降低美国军事介入地区事务的门槛；另一方面，“美日+”小多边机制的网络化扩张，加速东亚安全架构从“辐辏模式”向“阵营对抗”蜕变。在此背景下，深入解构日本战略转型的内在逻辑与实施路径，不仅关乎中国如何有效应对周边安全挑战，更对维护亚太战略稳定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

一、“根本性强军”的主要内容

本轮“根本性强军”与日本以往的军力建设方针迥异。其特殊性在于，日本从传统的增加装备数量转为主要聚焦于建设区域拒止体系^[1]和强化自主持续作战能力^[2]，依托卫星星座系统、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分散式打击体系，日本将建设覆盖第一岛链的“导弹屏障”。通过大量储备零件和弹药、加固和扩建军事基础设施、推动民用关键基础设施的军民两用化，日本谋求建设遂行长期高烈度战争的能力。根据防卫省《令和6年度预算概要》，2023—2027财年日本计划投入7万亿日元用于建设区域拒止体系的“防区外防卫能力”“指挥控制功能”及“外空”领域，同时投入15万亿日元强化自主持续作战能力的“持续性、强韧性”领域——两项投入合计占5年强军预算的53.7%，凸显其正将战略重心从传统防御转向前沿制衡。而且，日美与澳大利亚、韩国、菲律宾等盟国军事合作亦进入深水区，日美同盟向多边化准同盟发展。

[1] 本文未使用日方“反击能力”的措辞，而使用“区域拒止体系”表述。原因是：第一，反击能力，即进攻性武力只是日本建立的杀伤链的一环；第二，日本发展杀伤链的目的在于阻止敌方掌握特定地域内的制海、制空权。这实质是建立区域拒止体系。海上幕僚监部防卫部防卫课认为，鉴于攻击武器长射程化和日本周边的军事竞争形势，控制全部与日本利益相关的海域不现实，而应采取区域拒止的办法。参见日本海上自卫队海上幕僚监部防卫部防卫课、「变化する戦略環境と海上自衛隊」、「海幹校戦略研究」2024年3月、第9頁。

[2] 参见「『国力としての防衛力を総合的に考える有識者会議』報告書」、第5—6頁、日本内閣官房、2022年11月22日、https://www.cas.go.jp/jp/seisaku/boueiryoku_kaigi/pdf/20221122_houkokusyo.pdf。

（一）建设抗打击能力强且高效的区域拒止体系

日本防卫省指出，为强化本国军力，自卫队将重点采购防区外导弹，并致力于打造先进的侦察与指挥系统。此举旨在赋予日本从多地点、多平台发射多种型号导弹的能力，以有效打击舰艇及登陆部队等目标。^[1] 在此轮“根本性强军”进程中，日本着重强化侦察及作战指挥能力，并将西南方向^[2]作为力量部署的重点区域。

第一，构建侦察频度高、抗打击能力强的侦察体系。目前，日本所研发的多种导弹射程已达 1000 公里，超出了岸基和空基雷达的探测范围。为精准标定远距离舰船、陆上车辆等时间敏感目标，日本计划建立一个手段多样化、传感器分散布局的侦察体系，以支持导弹的远程作战。防卫省在继续使用既有大型侦察卫星的基础上，拟投入约 3200 亿日元建设一个由近百颗侦察小卫星组成的遥感卫星星座系统；除继续运用反潜巡逻机、“全球鹰”无人机外，还拟引进 23 架 MQ-9 长航时无人机，并装备目标观测用导弹等。通过侦察卫星、飞机与导弹的协同运用，日本的侦察体系将能为指挥系统提供分钟级更新频度的目标信息。

第二，建立三军统一、与美军高度融合且高效快速的作战指挥系统。鉴于使用分散部署、具有不同弹道特征的导弹攻击广域目标的复杂性，防卫省正在对指挥系统进行重大改革，以满足快速分配火力、精准规划飞行路径、避免误击友军或重复攻击的需要。为此，自卫队将建立联合作战司令部，整合陆、海、空三军的指挥系统，并在平时即开展跨域指挥。此前，美军已与自卫队建立了联合情报分析组织，并在运用 MQ-9 无人机等方面开展合作，这为双方在情报共享和作战协同方面奠定了基础。未来，美国

[1] 『防衛力抜本的強化の進捗と予算 令和 6 年度予算の概要』、第 11 頁、日本防衛省、2024 年 3 月 28 日、https://www.mod.go.jp/j/budget/yosan_gaiyo/2024/yosan_20240328.pdf。

[2] 主要指日本的西南诸岛，包括琉球群岛和部分先岛诸岛，具体涵盖冲绳岛、奄美大岛、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等关键区域，是日本构建“第一岛链”的重要环节，对于监视和遏制周边国家的军事活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还计划在日本本土建立统合军司令部，旨在强化与日本在指挥控制领域的军事合作。借助这一系列举措，日美将能够联手进行目标标定工作，从而更加高效地运用攻击性武器。

此外，自卫队将在杀伤链的各个环节引入人工智能，以辅助决策。2022年，时任首相岸田文雄会见了美国军事AI公司帕兰提尔（PLTR）的首席执行官卡普（Alexander Karp）。该公司开发的AI指挥软件被美军等广泛运用，可实时融合卫星、雷达、电子侦察等多源异构数据，快速为指挥官提供作战方案。2022年版日本《防卫力整備计划》提出，要“使用AI等使决策快速化”。2024年，日本发布的《AI运用基本方针》进一步明确，将在从目标判定到攻击规划的杀伤链全环节使用AI技术。防卫省技术本部披露的进度表显示，至2025财年末，新型AI目标识别系统将实现对东海海域舰艇的自动分类追踪。^[1]

第三，采购大量进攻性武器并集中部署于西南方向，以构建具备饱和攻击能力的打击体系。为增加敌方应对难度，防卫省计划中的进攻性武力具备三大特征：多平台同时发射、多弹道协同突防、规模集群化部署。^[2]2023—2027财年，防卫省计划将防区外导弹的预算提升至3万亿日元。^[3]在这一预算框架下，反舰火力建设将聚焦于三大维度：一是列装6型8款反舰导弹系统，包括高超音速武器和超音速巡航导弹等先进品类，其射程普遍突破1000公里；二是将地对舰导弹团从5个扩编至7个，同时，新建的高超音速导弹部队也将集成反舰作战能力；三是新型导弹将优先部署在九州和冲绳地区。为此，日本已扩充了西南方向导弹部队的编制，力求使西南方

[1]「不審船をAIが発見 海保や自衛隊、衛星画像利用」、『日本経済新聞』、2024年8月29日。

[2]『防卫力抜本的強化の進捗と予算 令和6年度予算の概要』、第11頁、日本防衛省、2024年3月28日、https://www.mod.go.jp/j/budget/yosan_gaiyo/2024/yosan_20240328.pdf。

[3] 防卫预算文件中此前弹药、制导弹药分类项下不包括采购远程进攻性武器。按旧口径计算，本期《防卫力整備计划》采购弹药、制导弹药总额为2万亿日元；按新口径计算，总额达5万亿日元。可推测差额3万亿日元为采购进攻性武器总额。

向的反舰火力密度提升至现役的3倍。^[1]以12式反舰导弹改进型陆基发射型为例，其年度采购额接近1000亿日元，根据价格推算，该型号的年采购量可能超过100枚。前自卫队高官称，未来自卫队的反舰导弹数量将“数以千计”。^[2]在对地攻击武器方面，则形成“引进+自研”双轨路径：除耗资1700亿日元引进400枚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外，日本还在自主研发2种共3个子型号的高超音速武器，以及1种可与12式地对舰导弹改进型共架发射的对地巡航导弹。值得注意的是，防卫省在2025年度预算中编制了约2600亿日元的专项预算，以建立高超音速导弹生产线。如此高额定向的投入在日本制导武器的发展史上实属罕见，这表明日本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将实现规模化生产的重大突破。

（二）发展自主的持续作战能力

此前，防卫省的采购计划往往侧重装备购置，却对后勤保障重视不足，导致自卫队部分装备的可出动率仅为50%左右。^[3]同时，弹药储备也难以满足长期高强度战争的需求，或仅能维持1周到数月的作战。^[4]这表明自卫队在实战中面临着后勤和补给的双重短板。为应对这一问题，日本本轮“根本性强军”注重发展自主的持续作战能力，具体举措包括大量储备零件和弹药、加固和扩建军事基础设施，以及推动民用关键基础设施的军民两用化。

第一，大量储备零件和弹药。2023—2024年度防卫预算中，自卫队年均装备维护费攀升至2.19万亿日元，较上个军力建设规划期（2019—2022年度）增长113%，其中30%专项用于战略级零部件的储备；年均弹药采购额高达8766亿日元，同比激增290%。随着弹药储备的增加，日本计划

[1]「地对艦ミサイル防衛 増強 陸自 南西けん制へ部隊再編」、『読売新聞』、2024年1月29日。

[2] 武居智久、「どうなる!?10年後の海上自衛隊」、『世界の艦船』、2024年3月号、第75頁。

[3]「防衛装備品、5割が稼働できず 弾薬など脆弱な継戦能力」、『日本経済新聞』、2022年9月5日。

[4]「[スカナー] 反撃能力 不可欠に 防衛力有識者会議」、『読売新聞』、2022年10月1日。

在全国新建 130 个弹药库，并将其分散布置以减少受打击时的损失。

第二，加固、扩建军事基础设施。2022 年版《防卫力整備計画》中，用于军用基建的预算同比增幅超过 400%。为提高抗打击能力，日本致力于重建或扩建军事基础设施。其主要指挥部将实现地下化、抗电磁脉冲化；机场将实现停机坪分散化，并加固待命飞机库；医院将增设病床与地下室；宿舍将实现水电供应备份化。在对军事设施进行拆旧建新时，新设施将具备三防、抗爆炸、抗电磁干扰和防范游击队攻击等功能，且设施间要确保足够的间距。

第三，推动民用机场、港口等关键基础设施军民两用化。2022 年版《国家防卫战略》称，为应对针对日本的入侵，将完善和强化西南地区等处机场和港湾的功能，使自卫队能够利用这些设施进行训练。据此，日本政府于 2023 年 11 月选定了 10 个道县的 38 个民用机场及港湾作为军民两用基础设施候选，供自卫队与海上保安厅在演习和危机时使用。其中，28 个位于九州与冲绳（14 个机场、14 个港口），占比达 70% 以上。而目前自卫队位于九州、冲绳，便于在台海作战的机场仅有 6 个。2024 年 10 月开始的日美“利剑 25”联合军演中，日美使用了 7 个民用机场，6 个民用港口。^[1]

（三）强化美日同盟与“美日+”安全合作

作为“根本性强军”的关键对外举措，日本致力于进一步强化“安全基轴”——美日同盟，并与美国共同推动其多边化。^[2]日本《国家防卫战略》明确提出，“须与同盟国、志同道合国家共同紧密合作才能阻止单方面改变现状”。日本积极推动美国改进指挥机制，并与美国的盟友伙伴，特别是地区关键盟友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开展紧密的安全合作。这些国家不仅在

[1]「日米、有事念頭に退避訓練 南西諸島で即応態勢 今年度最大の演習、4.5 万人規模」、『日本経済新聞』、2024 年 10 月 24 日。

[2]《国家防卫战略》第 13 页如此阐述日本强化自身军力和日美同盟的关系：我国的防卫力的根本的强化……将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的遏制力和应对能力。参见「国家防衛戦略」、第 13 頁、日本首相官邸、2022 年 12 月 16 日、<https://www.kantei.go.jp/jp/content/000119646.pdf>。

外交声明中与日美同调，强调所谓“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与美日间的安全合作也逐步走向“深水区”，“美日+”小多边安全“准同盟”正在形成。

首先，日美澳三边安全合作已实现从战略协调向联合作战的机制化跃升。作为美国“印太战略”框架下除日本、韩国之外最具军事投射能力的盟友，澳大利亚与日本正通过多层制度嵌套加速构建“准同盟”作战体系。在2024年9月日澳外长防长“2+2”会谈期间，时任日本防卫相木原稔称，日澳合作的新阶段是构建自卫队与澳军在任何状况下都能有效合作的态势，并和美国共同强化遏制力与应对能力。^[1]从发展趋势来看，未来澳军很可能直接协助日美作战。在制度层面，根据双边协商结果，澳军是自卫队能够执行“武器等防护”任务的三个外军之一，这标志着日澳军事互信达到战术协同层级；日澳还签署《部队访问协定》，以便于两国武装力量能方便地前往对方国军演乃至作战。在实践层面，三方合作正向联合作战方向发展。一是日澳开始讨论“紧急事态下军力运用合作的范围、目的及形态”。^[2]澳大利亚参加了日美设想干预涉华特定事务的计算机兵棋推演，其推演结果将用于修订相关作战计划。二是三方致力于提高作为联合作战基础的互操作性。日美澳、日澳联合军演趋于频繁，演训范围从传统反潜、制海作战扩展至太空态势感知、网络攻防等新兴领域，未来还将举行更多陆上、空中联演。这也成为演练自卫队“保护外军装备”——即联合作战的良好机会。另外，根据2024年9月日澳“2+2”会议达成的共识，澳大利亚将深度参与美日联合情报—指挥体系，三方未来将开展联合防空反导作战。^[3]

第二，日美韩以应对朝鲜导弹威胁为名推进三边指挥机制的融合。日美韩间的情报共享名义上是为朝鲜所发射导弹的信息，但实际上其“反导”概念已属于“综合防空反导”（IAMD）范畴，即突破了传统反导合作中“信

[1]「第11回日豪外務・防衛閣僚協議（「2+2」）の開催」、日本外務省、2024年9月5日、https://www.mofa.go.jp/mofaj/a_o/ocn/au/pageit_000001_01034.html。

[2]「日豪防衛協力」、日本防衛省、2023年1月16日、https://www.mod.go.jp/j/approach/exchange/area/pacific/pdf/australia_20230116.pdf。

[3]「第11回日豪外務・防衛閣僚協議（「2+2」）の開催」、日本外務省、2024年9月5日、https://www.mofa.go.jp/mofaj/a_o/ocn/au/pageit_000001_01034.html。

息共享—分工拦截”的单纯防御模式，而是系统整合各种传感器信息，统筹协调各军种资源，综合攻势、守势、分散部署手段，达成削弱对手导弹攻击效能与降低己方损伤的双重目标。简言之，共享导弹信息是美日韩跨领域开展一体化指挥的里程碑，标志着具备攻势力量的韩军未来可能与日美联合作战，以削弱地区对手的“导弹优势”。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度三国已举行两次跨域联演。

第三，美日菲实现情报、军事基地共享。尽管菲律宾军事实力相对较弱，但日本看中其地缘战略位置，试图将其打造为危机时的情报及军事基地提供者，以使对手面临更为复杂的局面。日本已开始向菲律宾提供防空警戒雷达，菲律宾则同意与日本共享雷达所获取的情报，双方的此类合作将强化日美在台湾地区南部的态势感知能力，尤其是在导弹探测方面。这意味着菲律宾至少可在危机时协助美日进行态势感知。更具危险性的是，美国与日本均试图使本国军力在菲律宾的部署便利化，2024年日本与菲律宾迅速商签《互惠准入协定》，美国也从菲律宾获取更多军事基地使用权，且在菲律宾长时间部署中程导弹。这表明未来存在美军、自卫队临时分散部署至菲律宾，甚至以菲为基地投射军力的可能性。

二、“根本性强军”的形成逻辑

日本出台“根本性强军”政策，源于多方面复杂因素的交织。其国内重实力轻意图的战略文化，使日本错误地将中国的军力发展视为“威胁”，因此引发其所谓的“安全焦虑”，进而基于前瞻性的力量对比评估和自身地缘海缘特点制定了有针对性的“根本性强军”方案。在其国内，由于缺乏有效制约使得防卫省的强军方案一路畅通，遇到的阻力很小。而美国作为外部因素，乐见日本强军并施加推力，这也加剧了本轮“根本性强军”的烈度。

（一）重实力轻意图的战略文化决定了日本一贯“料敌从宽”建设军力

在评估外部威胁时，多数国家通常会综合考量对手的军事力量、战略

意图及历史记录（过往行为）。^[1]然而，日本却长期秉持一种重实力轻意图的战略文化，即主要依据对手可能对日本使用的军事力量来评估外部威胁，而往往忽视对方是否具有危害日本的意图。例如，即便在政治家和社会普遍希望放缓军力发展的背景下，自卫队依然坚持“对手可随时变更意图，打算危害日本，到时再扩军为时晚矣”的论点^[2]，并基于对假想敌实力的威胁评估，制定了1976版《防卫计划大纲》附表。^[3]20世纪80年代末，尽管苏联对外战略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但日本依然延续了既有的军力建设力度和节奏，主要原因是防卫厅认为苏联虽然没有侵略意图，但具备侵略能力。^[4]这种偏颇的战略文化已经明确写入其国家安全战略文件，日本2022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为此辩称，“正确预测拥有强力军事能力的主体何时会有直接威胁外国的意志是困难的”。^[5]

日本防卫省的军力规划方法充分体现了其偏颇的战略文化，该方法基于“最大风险原则”（Principle of Maximum Risk），通过对假想敌未来实力的推演，根据在最严峻情形下赢得战争的需求，来确定日本应具备的军力。具体而言，这一规划过程分为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根据相关训令^[6]，在新军力建设规划完成前9年，由事务次官牵头的委员会启动《能力分析》文件的编制工作，明确“基础信息”，以构建假想敌在下个军力建设计划完成时的军事能力参数体系。以本轮“根本性强军”计划为例，“基础信息”

[1] 左希迎：《威胁评估与美国大战略的转变》，载《当代亚太》2018年第4期，第19页。

[2] 千々和泰明、「未完の『脱脅威論』」、『防衛研究所紀要』第18巻第1号（2015年11月）、第141頁。

[3] 高橋秀幸、「ポスト4次防期における航空自衛隊の防衛力整備構想と近代化—基盤の防衛力構想への対応とF-15導入を事例として—」、第51—52頁、日本防衛研究所、2016年3月、<http://www.nids.mod.go.jp/publication/senshi/pdf/201603/06.pdf>。

[4] 「『国会リポート』波紋呼ぶ海部首相の『防衛大綱“下方修正”』発言」、『読売新聞』、1990年4月10日。

[5] 「国家安全保障戦略」、第17頁、日本内閣官房、2022年12月16日、<https://www.cas.go.jp/jp/siryoku/221216anzenhoshou/nss-j.pdf>。

[6] 「防衛省防衛諸計画の作成等に関する訓令」、日本防衛省、2015年10月1日、http://www.clearing.mod.go.jp/kunrei_data/a_fd/2015/ax20151001_00032_000.pdf。

锚定于中国、朝鲜、俄罗斯在日本“周边的军事动向和未来技术水平”。^[1]第二阶段，在新军力建设规划完成前7年，委员会将基于前述《能力分析》文件中的“基础信息”开展能力评估，完成《能力评估》文件，识别军力的重大不足之处，从而确定军力规划的重点事项。国会答辩及相关报道显示，能力评估主要通过多情境推演方式进行，根据其中“料敌从宽”的剧本，推算出需新建军力，并最终形成《能力评估》文件。^[2]本轮“根本性强军”的推演设想为“发生对日本攻击且战况烈度最高的事态”。^[3]该规划体系折射出日本安全决策层的认知范式：将地缘政治简化为军备竞赛，通过“预防性能力建设”对冲意图判断的不确定性。这种基于“最坏情况假设”的战略文化，正成为东亚安全架构重构进程中的关键扰动因素。

（二）对“中国威胁”的错判促使日本开始本轮“根本性强军”

基于上述战略文化，日本忽视中国战略意图而紧盯中国军力发展，为了确保能与美国联手遏制中国甚至在冲突时“打败中国”，日本决意加速强化军力。

第一，日本本轮“根本性强军”的最高烈度推演场景是，在美国短期内无法大规模介入的情况下，日本干预“台海危机态势”。此次“根本性强军”之前的推演模拟了应对包括“两岸局势紧张”“朝鲜半岛战争”以及“钓鱼岛危机”等事态。^[4]在2023年5月日本参议院国会答辩披露的军事推演中，假想敌以多域协同作战模式对日本发动包括导弹攻击、海上攻击、空中攻

[1]「第211回国会 参议院 外交防衛委員会 第6号 令和5年3月30日」、日本国会会議録検索システム、2023年3月30日、<https://kokkai.ndl.go.jp/txt/121113950X00620230330>。

[2]「第211回国会 参议院 外交防衛委員会 第6号 令和5年3月30日」、日本国会会議録検索システム、2023年3月30日、<https://kokkai.ndl.go.jp/txt/121113950X00620230330>；「[政治の現場] 尖閣国有化1年（6）自衛隊だけで奪還困難」、『読売新聞』、2013年9月21日。

[3]「第211回国会 衆議院 安全保障委員会 第9号 令和5年4月18日」、日本国会会議録検索システム、2023年4月18日、https://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kaigiroku.nsf/html/kaigiroku/001521120230418009.htm。

[4]「日本の防衛、まだ出発点」、『日本経済新聞』、2023年1月5日。

击、岛屿登陆在内的复合攻击，目标涵盖美军基地和不限于西南群岛的广阔区域；日本承担起“主体责任”应对进攻，美军则负责支援。防卫省官员在答辩中默认了推演想定的是日本先对美国行使集体自卫权，随后自身遭受武力攻击。^[1]在上述推演事态中，朝鲜不具备登陆能力，因此“朝鲜半岛生战”可以首先被排除；在“钓鱼岛事态”中，中国不会首先攻击美军，中日进行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也很低；因此，剩余选项只有一种——所谓“烈度最高的日本受到武力攻击的事态”指的是日本配合美国武力干预“台海事态”。值得注意的是，美军并未在推演资料中出现^[2]，但防卫省却坚称美军会介入。这可能是因为推演设想美军在战争初期将主力撤到第二岛链以东，仅在日本保留小股部队，通过提供情报、发动远程攻击等方式支援自卫队作战。这与美军 2017 年后要减少在区域拒止威胁圈内损失的作战思想相符。^[3]防卫省根据推演结果确定了军力建设的重点领域和必要项目，并计算出了所需要的防卫费规模。^[4]

第二，日本认为，仅凭“日本自卫队 + 本地区美军”的力量，将难以在地区冲突中掌握地区制海权和制空权，这一认知引发了日本所谓的“安全焦虑”，并促使其决意开启本轮“根本性强军”。在制定 2018 版《防卫计划大纲》时，日本防卫省官员尚认为，日本无法单独与中国对抗，其应对路径是“提高日美同盟的遏制力”^[5]，即当时日本认为日美同盟仍占据军

[1] 关于上述推演情况和防卫省官员答辩参见「第 211 回国会 参议院 外交防衛委員会 第 12 号 令和 5 年 5 月 9 日」中编号 045 至 050，056 至 062 的政府答辩，<https://kokkai.ndl.go.jp/txt/121113950X01220230509>。

[2] 「第 212 回国会 参议院 外交防衛委員会 第 3 号 令和 5 年 11 月 14 日」、日本国会会議録検索システム、2023 年 11 月 14 日、<https://kokkai.ndl.go.jp/txt/121213950X00320231114/226>。

[3] 美军自 2017 年后陆续提出了分布式海上作战(DMO)、远征前沿基地作战(EABO)、敏捷作战部署(ACE)等多种新作战构想，共同点是减少在区域拒止威胁圈内损失。

[4] 「第 211 回国会 衆議院 予算委員会 第 15 号 令和 5 年 2 月 28 日」、日本国会会議録検索システム、2023 年 2 月 28 日、<https://kokkai.ndl.go.jp/txt/121105261X01520230228>。

[5] 「[政治の現場] 日中 40 年(2) 現状破る海洋進出 脅威」、『読売新聞』、2018 年 10 月 24 日；「[スキャナー] 米軍 揺らぐ優位性 年次報告 中国 部隊・兵器を急拡大」、『読売新聞』、2018 年 8 月 18 日。

力优势。然而，在制定本轮“根本性强军”计划时，日本已通过推演认定，随着中国军力的不断发展，到2027年，如果日本配合美国干预特定“台海危机态势”，仅凭在亚洲的美军和自卫队的现有兵力将难以应对中国。^[1]

日本倾向于认为，中方无论是否利用导弹优势，都有可能掌握制海制空权，从而开展登陆作战。^[2]日本高烈度战争推演的可能情境之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利用“导弹优势”夺取制海制空权。如果解放军使用中程导弹等攻击日美用于在中国周边作战的机场、雷达、通信设施等目标，日方将面临反导弹药用尽、因导弹攻击而损失惨重的局面。^[3]在机场暂时无法使用的情况下，中方将追加使用航空兵力进一步摧毁机场等目标。^[4]在日美丧失前沿航空战力的情况下，中方将掌握战区制空权，进而掌握制海权，从而使得美日难以再有效干预解放军的登陆作战。

日本高烈度战争推演的可能情境之二是，在交战双方为限制战争升级、避免大规模攻击对方本土目标的前提下^[5]，制空权与制海权的争夺将成为军事对抗的核心场域。在这种情境下，防卫省评估的关键在于对比中国与日本及驻日美军可动用的海空军力量数量。在海军方面，自卫队与驻日美

[1] 「日本の防衛、まだ出発点」、『日本経済新聞』、2023年1月5日。

[2] 因无法得知防卫省推演情境与具体结果，故根据日本战略研究论坛、国际问题研究所等有前政府高官参与的推演推测了以下情境。

[3] 参见日本战略研究フォーラム、「第3回政策シミュレーションの成果概要」、第19、21頁、2023年7月28日、<https://www.jfss.gr.jp/public/images/file/2023-07-28/16905342786422.pdf>；日本战略研究フォーラム、「第1回政策シミュレーションの成果概要」、第29、31頁、2021年12月3日、<https://jfss.gr.jp/public/images/file/2021-12-03/16385000144426.pdf>。

[4] 在2022年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推演中，中方采用了这种战术。参见小谷哲男、「台湾海峡有事シミュレーション：概要と評価」、2023年3月30日、<https://jiia.repo.nii.ac.jp/records/1497#>。

[5] 在日本战略研究论坛的第三次涉台推演中，即使“中方先攻击日本基地”，美方也对攻击大陆目标犹豫；在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推演中，考虑到了中方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可能性，这反映出参与者担忧事态升级。而在日美政府推演中，也曾出现美国不愿攻击中国目标的情况，参见藤田直央、「前自衛隊制服組トップ、アショア断念への苦言と敵基地攻撃能力への執心」、論座アイカブ、2020年7月15日、<https://webronza.asahi.com/politics/articles/2020071400010.html?page=3>。

军正在逐步丧失优势。考虑到中国海军主战舰艇数量多于美日且建造军舰的速度快于日本、驻日美军的军舰数量基本保持稳定，以及在战时美军可能不会冒风险派舰来援等因素，按照中方对日可用海军兵力为总兵力的 2/3 来计算，自卫队和驻日美军在海军力量上的传统优势将逐渐丧失。此外，在防卫省看来，中国已经部署了较为完备的海域态势感知系统，岸基导弹和陆基航空力量也将是争夺制海权的有力手段。而空中力量对比同样呈现结构性失衡，截至 2023 年，解放军已拥有 1500 架第四代及第五代战斗机，该数量达到自卫队与驻日、驻韩美军战机总量的 2 倍以上。即便中方保留部分兵力以应对其他战略方向的潜在威胁，其可用兵力仍能形成对日美的优势。面对这种态势，自卫队军官开始建议空中自卫队导入“利于物理战斗力处于劣势一方获得胜利的机动战理论”，凸显出日本在军事力量对比上的焦虑。^[1]

（三）基于地缘特点和整体力量对比确定了阻止中国掌握制海制空权的目标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在特定的两个国家之间，地理、军事技术层面的攻防平衡能够重塑军事对峙的结构。^[2]这一因素与前述推演结果共同催化出“根本性强军”的目标——建设区域拒止体系和强化持续作战能力，以阻止中国掌握制海制空权。这意味着日本“根本性强军”的“制胜理论”不是简单地增加飞机、军舰的数量，而是利用地缘优势和技术进步，建设己方的区域拒止体系并削弱中国的区域拒止能力，从而阻止中国在短期内掌握制海制空权；同时，日本试图通过强化持续作战能力来克服岛国的劣势，将战争拖入持久战，最终凭借美军的整体军力优势和日本的军力联合“击败中国”。

首先，地理特征的稳定性使得日本高度重视制海制空权的争夺。国家间的距离、边境地形和相对位置等因素会影响一国对另一国可投射的军事

[1] 柳田修、「航空自衛隊における機動戦理論の適用」、『エアパワー研究』第3号、第71頁。

[2] [加]诺林·里普斯曼、[美]杰弗里·托利弗、[美]斯蒂芬·洛贝尔：《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刘丰、张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8—39页。

力量的规模与强度，进而影响两国之间的真实战力对比。日本列岛地处欧亚大陆东缘的环太平洋岛链体系，其孤悬海上的地缘特征构筑了天然的战略屏障。此外，从中国大陆到日本本土距离超过 700 公里，这一空间尺度已超越现代战争史上跨海登陆作战的普遍性案例。在日本看来，这一地缘格局赋予了日本双重的战略优势：只要不丧失海空优势，就可有效保护本土安全并维持经济系统运转，强大的大陆国家就难以对日本构成实质性威胁；同时凭借自身处于大陆外缘且扼守大陆国家前往太平洋水道的地理锁钥地位，若能掌握制海制空权，就能对同样依赖海运的大陆国家形成优势。

第二，现代导弹技术的发展重构了传统的攻防成本，攻防间的力量对比亦随之改变。当前，远程导弹已成为掌握广域制海制空权的重要手段。日本认为，使用导弹以攻为守更为有利。一方面，攻方的成本低廉。无人机、卫星星座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进步，大幅提升了海域态势感知体系的可靠性与抗打击能力，降低了成本。实时跟踪和识别大洋上的军舰不再是难题。在西南方向，只要日本能够凭借制空权保护岸基导弹，使用普通岸基反舰导弹即可封锁从九州到与那国岛的水道，而使用远程反舰导弹则可威胁第一岛链内的大部分海域与港口。例如，射程约 200 公里的日本 12 式岸基反舰导弹的单价约为 3 亿日元；美国的远程反舰导弹（LRASM）的单价约为 300 万美元；而中程弹道导弹已具备精确毁伤机场跑道与港口设施的能力，能显著降低战略要地的瘫痪成本，日方估计中国 DF-21 弹道导弹的单价为 70 万美元。^[1]另一方面，守方的成本高昂。搭载有限防空导弹的军舰价格昂贵，如日本的摩耶级宙斯盾舰价格约为 1400 亿日元；拦截弹道导弹的 SM-3 导弹单价为 1800 万美元，PAC-3 导弹单价在 200 万美元以上。相较之下，进攻方的成本优势明显，这使得日本更倾向于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通过发展远程导弹等进攻性武器，以较低的成本实现对潜在对手的有效威慑和打击。

[1] 浅野亮、山内敏秀編集：『中国の海上権力』、創土社、2014 年、第 157 頁；布施哲：『米軍と人民解放軍』、講談社現代新書、2014 年、第 91 頁。

（四）缺乏国内制约使本轮“根本性强军”畅通无阻

按照制度和惯例，政府需将防卫省制定的军力建设规划草案提交外部审查，其主要包括政府内部折冲、专家会议。在本轮“根本性强军”的决策过程中，防卫省的方案一路畅通，不仅拟定的“强军”方向和目标没有受到质疑，“强军”的具体规划和预算的大幅增长也没有遭遇过多阻力。究其原因，在于防卫省的政策制定机制实际上已形成了一个“封闭运行”的系统，该系统包含多重去制约化路径。在行政体系层面，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主导的“四大臣会议”机制将军事决策权高度集中于“防卫省—首相官邸”一线，借助预算审议程序的后置化运作模式，排除了财务省等财政约束部门的实质性参与。而在政策合法化过程中，政府通过制造“既成事实”、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倒逼社会共识重构，最终形成政治精英、官僚集团与部分民意三者间脆弱却有效的动态平衡。

第一，其他部门对防卫省的制约作用有限。通常情况下，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折冲在文件出台前进行，是影响力度最大的环节。财务省的主要职责是控制预算，因此对防卫省提出的预算最有动力进行质疑。然而，实质性确定军事政策的会议是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四大臣会议及其配套会议^[1]，财务省并不在列，这导致其难以从早期开始介入决策——在财务省与防卫省正式折冲前，主要的军力建设项目已基本敲定。^[2]加之日本政策界人士认为，强化遏制力可避免“中日战争导致日本损失 1000 万亿日元”，这是一种低成本策略。^[3]因此，在这轮“根本性强军”中，财务省甚至未能实现

[1] 「岸田内閣総理大臣記者会見」、首相官邸、2022 年 12 月 16 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1_kishida/statement/2022/1216kaiken.html；「[スキャナー] 防衛費増自民が主導 要求 48 兆円 防衛省を後押し」、『読売新聞』、2022 年 11 月 27 日；「次期中期防 総額 43 兆円 23 年度から 5 年間 防衛省が提示」、『読売新聞』、2022 年 12 月 2 日。

[2] 「[始動 岸田改造内閣] (下) 防衛 台湾緊迫で前面 予算増 財源など壁も」、『読売新聞』、2022 年 8 月 13 日。

[3] 参见兼原信克接受访谈时的发言。「“もしトラ”世界はどうなる?」、Youtube、2024 年 1 月 24 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aVUIcfZUls>。

将预算削减至平均值的通行惯例^[1]，仅使5年军费预算总额减少约5万亿日元。^[2]截至目前，“根本性强军”的预算落实和执行基本顺利。而外务省作为另一个参与折冲的重要部门，也没有质疑强军的动力。2022年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称，拥有能够保护自己国家的防卫力量是稳固外交的基础。此外，近年来美国对日本强军持鼓励态度，外务省从对美关系的角度考虑也乐见其成。

第二，外部专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往往沦为背书工具。《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战略文件无需经国会审议，日本政府为显示其“合法性”，通常会在出台文件前召集专家会议。然而，这种会议往往仅具仪式性。从形式上看，会议讨论的基础资料由防卫省主导制定。^[3]从人选上看，前防卫省、自卫队官员频繁作为专家参与讨论，例如前防卫次官黑江哲朗曾在会议上明确表示支持重点发展进攻性能力、持续作战能力。^[4]从效果上看，专家讨论只是对政府观点的事后追认。以此次“强军”方案为例，2022年9月政府便已在首次专家会上拿出了“强军”要点，即防区外防卫能力（进攻性武力）、综合防空反导能力、持续性与强韧性等“七根支柱”。^[5]有参与者，如京都大学法学教授中西宽，曾委婉批评会议流于形式，“会议时间有限，专家无法充分交流”，“国民仍很难了解在三份文件的决策中，是谁、以什么形式发挥了作用”。^[6]

[1] 按照惯例，防卫省通常会多报预算，留出在谈判中向财务省让步的空间，5年军费总预算通常是两部门报价的均值。

[2] 「[スキャナー] 防衛費増 自民が主導 要求48兆円 防衛省を後押し」、『読売新聞』、2022年11月27日。

[3] 2022年专家会议中引导决定强军的主要资料《防卫力的根本性强化》和《安全环境的变化和防卫力强化的必要性》均由防卫省出身官员制定。

[4] 「国力としての防衛力を総合的に考える有識者会議（第2回）議事録」、日本内閣官房、2022年10月20日、https://www.cas.go.jp/jp/seisaku/boueiryoku_kaigi/dai2/gijiroku.pdf。

[5] 「安全保障環境の変化と防衛力強化の必要性」、第16頁、日本内閣官房、2022年9月30日、https://www.cas.go.jp/jp/seisaku/boueiryoku_kaigi/dai1/siryoku3.pdf。

[6] 「国力としての防衛力を総合的に考える有識者会議（第4回）議事録」、日本内閣官房、2022年11月21日、https://www.cas.go.jp/jp/seisaku/boueiryoku_kaigi/dai4/gijiroku.pdf。

第三，日本民众对军事扩张的立场存在可塑性，且民意作用有限。从历史上看，日本政府提出“强军”计划通常会遭到民众反对，但实际上民意始终未能阻止强军这一进程。2015 年安保法案审议期间，尽管超过 53% 的民众明确反对，但该法案仍获国会通过。值得关注的是，2022、2024 年的民调显示，“强军、发展进攻性武器”的政策主张已得到 60%~70% 民众的支持；反对者的主要诉求是反对为强军增税。^[1]而这种矛盾的消解来自于日本政府的危机叙事策略：通过发布《防卫白皮书》和频频向媒体传递“独家新闻”渲染周边“安全威胁”，将复杂的安全政策转化为“生存权保障”的二元选择——“要钱还是要安全”，当把风险说得足够可怕，民众自然愿意掏钱买单。

（五）美国是影响日本强军速度与烈度的外驱力

日本做出本轮“根本性强军”决策主要出于内因，而美国乐见日本强军、要求日本强军，这进一步强化了日本“根本性强军”的决心，并加剧了其强军的烈度。一方面，日本酝酿强军要早于美国对日施压之前。时任首相岸田文雄在 2022 年 5 月的日美首脑会谈中首次承诺将大幅增加军费，并考虑建立“反击能力”。而日本围绕所谓“中国威胁”的评估早已启动，剧本推演在安倍第二次执政时期就已经进行。^[2]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在 2021 年就已经将军费增至 GDP 的 2% 写入选举承诺。日本甚至早在 2013 年就曾试图发展攻击能力，但当时被美方拒绝。^[3]

另一方面，日方战略界长期存在“借美促变”的操作传统，无论是防

[1]「寄付規制「より厳しく」66% 本社世論調査——「反撃能力」賛成 65% 5 月調査から 5 ポイント上昇」、『日本経済新聞』、2022 年 11 月 28 日；「日米共同世論調査 質問と回答」、『読売新聞』、2024 年 12 月 21 日；「全国世論調査 質問と回答」、『読売新聞』、2024 年 4 月 8 日。

[2]「弱者の日本、どう守る」、『日本経済新聞』、2022 年 1 月 6 日。

[3]「米巡航ミサイル『トマホーク』購入、日本政府が結めの交渉…抑止力強化に不可欠と判断」、読売新聞、2022 年 10 月 27 日、<https://www.yomiuri.co.jp/politics/20221027-OYT1T50301/2/>。

卫省官员还是自民党议员，都有利用美国压力来促成军费增长的想法。^[1]从预算金额上看，美国压力大约使本轮日本5年防卫总预算增长了1万亿~2万亿日元。2022年9—10月间，防卫省要求的5年军费总额为48万亿日元，财务省希望压缩至35万亿日元。在这场预算拉锯^[2]中，美方通过外务省、国家安全保障局施压，促使岸田内阁将最终额度定为43万亿日元，较常规折中方案多出1万亿~2万亿日元，约占五年军费增量的15%。^[3]

三、“根本性强军”的影响

日本本轮“根本性强军”将大幅强化日本的进攻能力以及日本助美对华成本强加的能力，将推升美国军事介入地区事态的能力与意愿，加大域外势力干涉地区安全事务的可能，这将影响周边国家安全与地区安全稳定。基于现实主义逻辑，日本在“强军”加持下可能更有“信心”强化对华战略竞争，中日之间的合作面可能受到抑制，因此将加大中日关系改善的难度。

（一）给周边国家国土安全与军事安全带来挑战

日本本轮“根本性强军”尽管并未大幅增加自卫队的飞机、军舰等主要平台数量，但指向性明显、实战导向突出，对周边国家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战略安全的影响不可小觑。

第一，日本将更有能力干扰假想对手掌握周边海域的作战主动。日本的进攻性武力以7个陆基导弹团为主，辅之以空基、海基、潜射导弹。鉴

[1]「『GDP比2%』自民が提言——防衛費、膨張呼ぶ米の風圧、トランプ氏を意識（真相深層）」、『日本経済新聞』、2018年6月1日；「『外交の岸田』密かに仕込んだ防衛費増額 置き去りになった国内議論」、朝日新聞、2022年5月25日、<https://digital.asahi.com/articles/ASQ5T6FMSQ5TUTFK010.html>。

[2]12月初，防卫省让步至43万亿日元，财务省让步至40万亿日元。参见「防衛費大幅増は規模ありき？ 有識者会議の議事録から浮かぶ懸念の声」、朝日新聞、2023年3月7日、<https://digital.asahi.com/articles/ASR366RLJR27UTFK011.html>。

[3]「日米首脳会談で同盟“新段階”へ 安全保障の今後」、BS朝日、2023年1月13日、https://www.bs-asahi.co.jp/sunday_scoop/interview/129/。

于海基平台生存能力差，仅计算 7 个陆基导弹团的单次发射能力，再假设空基平台和潜艇能出动约 1/3 开展反舰作战，单次发射反舰巡航导弹的数量即可达到至少 500 枚。^[1]而且这些导弹应当具有较强的隐身能力和抗干扰能力。考虑到美军航母打击群通常配备 5—7 艘防空反导舰只，自卫队的反舰能力将于数年后达到足以对单支强大舰队开展饱和攻击的水平。如考虑陆基发射平台的再装填能力，以及将于 2030 年代早期入役的高超音速反舰武器，自卫队的远程反舰能力将达到全球一流水平。

此外，日本区域拒止体系的态势感知依靠卫星星座、隐身战机等多种传感器，无法通过打击少数节点进行破坏。发射平台中，陆基平台可分散机动部署，且位于防空兵力掩护下；潜艇可利用导弹的长射程隐蔽于第一岛链之外；在完成机场军民两用化后，空基发射平台的生存性亦将有所增强。这意味着如果日方配合美国严重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或通过军事手段滋事挑衅、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受侵害或反干涉一方在大幅削弱美日区域拒止能力之前，海空行动面临的风险将变高。

第二，日本的“强军”将削弱假想对手区域拒止的效果。在日本大幅增强可用机场数量，且采取分散布置停机坪、加固指挥措施与待机机库、增加弹药库数量等措施后，毁伤此类高价值目标所需的弹药数量将大幅增加。^[2]其假想对手使用弹道导弹瘫痪美日前沿基地的难度亦随之提升。而且，鉴于自卫队与驻日美军飞机可在全国甚至菲律宾、韩国的数十个机场间转移，在地面被摧毁的概率将降低，作战灵活性将有所增强。如此，自卫队与美军将有更多航空兵力和前沿航空基地可用于争夺战区制空权，为日美陆基导弹发射平台与机场提供防空掩护，为美军战略轰炸机护航，出动飞机进行反舰侦察与作战等。

[1] 自卫队拥有 7 个地对舰导弹团，按每个团拥有 4 个中队计算，则单次可发射 448 枚地对舰导弹；再考虑潜艇和 F-2、F-35 战机的反舰能力，可得出此结论。

[2] 峯村健司、「台湾有事シミュレーション 第二回 諸施設の利用と民間企業の協力」、キャノングローバル戦略研究所、2023 年 10 月 13 日、https://cigs.canon/article/20231013_7700.html。

第三，美日同盟多边化将打破地区军力既有平衡。韩国军队主战装备数量约为日本的 2/3，且正在着重强化攻击能力。如韩国选择配合美、日的军事干涉行动，势必将使美日假想对手在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时面临更复杂棘手的局面。澳大利亚位于第二岛链外，因距离远而易守难攻。澳军目前有能力在冲绳周边和第一岛链外为日美提供反潜、护航等支援，甚至能向日派遣 F-35 战机协助美日争夺制空权；未来其装备 9 艘宙斯盾舰及核潜艇后，还能为美日提供相当有力的反导和海上支援；必要时，澳还可能为美日临时转移高价值作战平台提供不易受到攻击的军事基地。

（二）推升美国军事干涉地区事务的能力与意愿

日本乐于本轮“根本性强军”形成的战力为美国所用。经过提升的日本作战能力，有望成为美国插手地区安全事务的“力量倍增器”，增强美国军事介入地区事态的信心。

首先，美军在地区危机事态初期的干预能力将得到增强。美军认为，随着假想对手海上实力的不断提升，特别是近海作战能力的强化，危机事态初期，美军航母在假想对手区域拒止圈内行动将面临较大威胁。为此，美军计划将有生力量分散化部署以降低风险，即将军舰、海军陆战队分成多股分散行动。^[1]但即使如此，由于美军驱逐舰的载弹量较为有限且进行海上补给难度较大，其生存能力依旧堪忧。美国海军陆战队新编成的濒海作战团的火力投射能力也比较有限，其装备的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NMESIS）射程仅约 200 公里，齐射能力仅为 36 发。

相比之下，日本自卫队进攻性武力的单次投射火力远超本地区美军，且同样具备分散部署的特性；而作为主力的陆基发射平台隐蔽性强且位于己方防空圈内。在日本的推动下，美国开始在日本建立“统合军司令部”，以指挥在日周边的美军作战并与自卫队新建的联合作战司令部对接。日本

[1] 菊地茂雄、「沿海域作戦に関する米海兵隊作戦コンセプトの展開—『前方海軍基地』の『防衛』と『海軍・海兵隊統合（NavalIntegration）』」、「安全保障戦略研究」、2020 年 8 月、第 67—70 頁。

“将和反导领域一样，与美合作”使用进攻性武力，未来由自卫队攻击美军指定的目标。^[1]因此，日本的区域拒止能力将被美国所用，这能够大幅增强美方在干预初期对海、对陆火力投射的强度与可靠性。

其次，日本的“强军”将为美军以全球力量驰援本地区争取时间。自卫队具备威胁假想对手海军的能力和长期持续作战能力，其假想对手在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时势必需要降低前述风险。而从科索沃战争、俄乌冲突经验看，即使一方基本掌握制空权，清除分散在广域陆地的机动目标依然将耗时费力甚多。如果在作战中出现类似情况，美军就有可能调动更多军事资源，发挥整体军力优势。

第三，自卫队将为美军的打击力量提供更为可靠的保护。根据近期美日演习情况，美设想使用战略轰炸机从远方基地起飞，飞抵日本列岛以东的预设空域，模拟对假想目标进行打击。如前所述，因美日前沿航空战力生存能力的增强，美战略轰炸机将能更“安全地”发射武器。美军海军陆战队濒海作战团实施“远征前进基地作战”（EABO）的主战场是西南诸岛，而日本大量军民两用的机场、港口将成为其执行分散化战术、实现以陆制海、以陆制陆的重要据点。日本部署于西南诸岛的防空导弹等也将为美国海军陆战队提供掩护。

第四，强化美国武力介入地区事务的信心。日本本轮“根本性强军”不仅整体上提高了美日干预能力，更意味着在军事介入地区事务初期，美军士兵、航母和战略轰炸机等高价值作战平台的损失风险降低。这将减少美国在做出干涉决策时所面临的国内阻力。

（三）重塑美国在东亚的安全框架及日本角色

日本能为美国所用的战力占据美国在本地区能使用军事资源的相当部分，由此，日本在美国东亚安全盟伴体系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这表现为，日本既是美国介入地区安全事务不可或缺的盟友，同时也是“美日+”多边

[1]「日米、部隊運用の戦略統合 自衛隊・米軍、指揮系統で連携探る 有事念頭に抑止力強化へ」、『日本経済新聞』、2024年5月3日。

盟伴网络的锚点。日本的安全角色发生了嬗变，既有的以美国为绝对中心的多个“1+1”同盟组成的美国东亚安全框架也随之发生嬗变。日本在美日同盟、“美日+”多边准同盟体系中的发言权均得到较大提升。

首先，美国正式认可了日本在美盟伴体系中的“副班长”地位。2024年7月，日美“2+2”会议声称，“双方重新确认，美日同盟是深化、扩展与澳、韩、菲、东盟、太平洋岛国、北约等国家和国际组织等多边合作的行动的核心”。^[1]这实现了第五份“阿米蒂奇—奈报告”（Armitage-Nye Report）关于美主日从地位改变的“预言”，标志着日本被赋予不同于美国其他盟伴的角色和作用。^[2]

第二，推动美国盟伴体系进一步走向网络化。如果没有日本提供的随时可使用的进攻性武力、大量的前沿基地以及在假想对手区域拒止圈内较长时间进行高烈度作战的能力，美国干涉地区安全事务的能力和信心将受到较大影响。而美国若无法有效干预地区危机事态，自然难以使韩、澳、菲等盟伴在台湾、南海等问题上保持总体一致的态度并在安全能力建设上与美日强化互操作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的“根本性强军”进程推动了美国与本地区盟伴关系的转变，从传统的双边安全机制向以美日轴心为核心的多边网络化体系转型。这种结构性调整本质上反映了西方阵营针对战略竞争对手的体系性重组，这一阵营的成员对待竞争对手的态度总体以遏制为主，仅在程度上存在差异。

第三，日本在美盟伴网络中的话语权显著提升。若不能实现同盟情报共享体系与联合指挥架构，就难以有效运用日本强化后的军力。通过建立

[1]「日米安全保障協議委員会（日米「2+2」）（概要）」、日本外務省、2024年7月28日、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pressit_000001_00943.html。

[2]“阿米蒂奇—奈报告”是由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和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Joseph Nye）牵头出台的关于美日同盟建设的智库报告，因作者广泛与日美安全政策圈人士接触，故对美日同盟的发展方向有一定见解。2000年以来共发布了6份报告。参见Richard L. Armitage and Joseph S. Nye, “The U.S.-Japan Alliance in 2020,” Armitage International, December 2020, https://www.armitageinternational.com/wp-content/uploads/2021/01/120720_ArmitageNye_USJapanAlliance_Report.pdf。

美日联合情报分析小组，双方已实现情报的实时汇集与协同分析。应日本要求，美国在日新建“统合军司令部”，该机构作为区域联合作战中枢，不仅负责统筹日本及其周边海空域的军事行动规划，并与自卫队的联合作战司令部对接。^[1]日美间既有的同盟协调机制（ACM）仍将继续发挥作用，而美军新建的指挥机构将负责指挥或与盟国协调指挥在“日本及周边”活动的美军及盟国军队。换言之，日本将成为唯一能够深度嵌入美国最新的“联盟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CJADC2）^[2]体系的盟友，在亚太地区盟国中对美国军事决策影响力最大。

（四）加大中日关系改善的难度

日本奉行偏颇的战略文化，长期将中国崛起视为威胁。日本政治精英自负地认为，在全球层面，中美之间是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竞逐；而在地区层面，中日之间同样是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角力。^[3]如果日本的“根本性强军”进展顺利，日本对周边海域舰船的攻击能力将得到增强。换言之，即使不依靠美国，日本的基本国家安全也能得到保障。日本可以此为依托，持续与中国开展竞争，遏制中国的发展，中日之间可能长期陷入“冷和平状态”。日本臆测所谓“遏制力”的提升将降低热战风险，从而将更为积极地鼓动美国遏压中国。即使美国对华关系出现改善转圜，日本可能也不会改善对华关系，而是继续奉行旧战略，并努力说服美国应继续与中国竞争。

日本还可能把在“根本性强军”中获得的战力向本地区与中国有领土主权或涉海权益争端的国家输出。近年来，日本持续支援相关国家与中国在海上对抗，向越南、菲律宾提供巡逻船，协助相关国家提高海域态势感

[1] 「日米安全保障協議委員会（「2+2」）共同発表」、日本外務省、2024年7月28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704432.pdf>。

[2] 这一体系是在“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基础上发展而来，旨在实现美军内部跨域无缝集成和实时指挥控制的同时，联通盟友和合作伙伴的指挥控制系统，强化联盟间协同作战能力。

[3] 吴怀中：《日本对华安全战略：一项制衡议程的新近分析》，载《日本学刊》2021年第5期，第63页。

知能力，在“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机制下向多国提供军船动向等敏感信息，且有单独向相关国家提供涉海敏感情报的意愿。日本已经将武器出口视为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1]，2023年4月又创设了“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SA）制度，用以向“志同道合国家”提供安全援助，提高对象国的安保能力和遏制力。在日本即将装备新一代反舰导弹之时，其很可能向中国周边国家提供相关敏感信息，并出售旧款导弹或新型导弹缩水版，在本地区加速对华区域拒止能力扩散。这将加剧本地区军事对抗与海上对峙的氛围。

结 语

综上所述，作为日本本轮国家安全战略调整的最重要内容，“根本性强军”的具体举措正在推进和落实。日本着力构建抗打击能力强且高效的区域拒止体系，通过扩容零件弹药储备、提高军事设施和军民两用设施安全韧性来发展无盟伴支援下可持续作战能力，加速强化美日同盟及“美日+”安全合作。日本长期奉行重实力、轻意图的战略文化，在威胁评估中往往“料敌从宽”设想十年后与假想敌的实力对比，使其得出了面临“中国威胁”的错误判断。基于地缘特点和力量对比分析，日本确定了本轮“根本性强军”的主要目标——阻止中国掌握制海制空权。石破茂上台后虽释放出改善中日关系的信号，但没有回调日本国家安全战略，“根本性强军”仍在推进。在2025年2月初石破茂访美并与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会晤后发表的《日美首脑联合声明》中，日方承诺至2027财年构建可承担切实防卫日本的主体责任的能力，2027财年后也将“继续根本性地强化军力”，美方表示欢迎；同时，声明重申将改进各自的指挥控制系统，继续深化日美同盟。^[2]

[1]「国家安全保障戦略」、第20頁、日本内閣府、2022年12月16日、<https://www.cas.go.jp/jp/siryou/221216anzenhoshou/nss-j.pdf>。

[2]「日米首脳共同声明」、日本外務省、2025年2月7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791692.pdf>。

面对持“美国优先”立场且轻视盟友的特朗普，日本在安保政策方面很可能选择沿袭既有“强军”方针。

日本“根本性强军”既图对华威慑，也切实提高了自身备战作战水平，将推高地区紧张，加大中日关系改善的难度，助推世界趋向“阵营化”。“根本性强军”并不符合日本民众的切身利益，日本民众对自卫队参与战争的担忧使自卫队招募兵员愈发困难。^[1]而且，正如2023年5月日本的一份民调所显示的，日本民众也尚未对随美高烈度干预地区危机事态做好心理准备。^[2]

【收稿日期：2024-11-21】

【修回日期：2025-02-18】

（责任编辑：邢嫣）

[1] 「再就職先拡充、定年引き上げ… 自衛官の処遇改善へ政府が基本方針」、朝日新聞、2024年12月20日、<https://digital.asahi.com/articles/ASSDN3C9WSDNUTFK01RM.html>。

[2] 在2023年的民调中，仅11%日本民众认为自卫队应与美军联合动武干预台湾问题。参见「台湾有事『日本が巻き込まれる不安』80% 朝日郵送世論調査」、朝日新聞、2023年5月1日、<https://digital.asahi.com/articles/ASR4X6VQ2R4CUZPS002.html>。